

中文晤談評量問卷內部結構之探究：個案層次分析*

陳慶福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凱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晤談評量問卷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 是一份過去經常被作為評量諮商影響的自陳式工具, 且此問卷在過去, 也經常被視為是評量諮商歷程與結果的工具。Stiles、Gordon 和 Lani (2002) 所發展的最新版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Form 5 (SEQ-5), 係由 21 對語意區分的相對形容詞所組成, 各題項均採 7 點評量的方式計分。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用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翻譯自 SEQ-5 的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 (Chi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EQ), 探討個案層次 C-SEQ 的內部結構。研究方法: 參與者為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間, 至台灣的 21 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接受心理諮商之大學生, 共計 200 位 ($N = 200$), 每一位參與者在最近一次接受諮商後, 填答一份中文 C-SEQ, 本研究據此進行 C-SEQ 內部結構的探討。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資料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 可以確認 C-SEQ 包含: 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勵性的四個因素結構; 在晤談評量向度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分別為深度性與順暢性, 以及正向性與激勵性。研究結論: 個案層次的 C-SEQ 包含四個因素的結構, 此問卷的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因素間存在低度至中度的相關; 此問卷可提供國內諮商實務之回饋和諮商歷程研究之用途。本研究依據研究的發現與限制, 提出對未來諮商實務與研究的具體建議。

關鍵詞: 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內部結構、英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晤談影響

* 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 陳凱婷, 通訊方式: psychickai@gmail.com

2. 由衷感謝暨南國際大學蕭文老師對本研究之啟發, 匿名審查者提供本論文寶貴之修正意見, 與屏東大學吳佩真博士和台灣師大吳清麟博士, 提供資料分析之專業意見; 作者也一併感謝研究參與者, 熱心協助本研究之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以及曾經協助過本研究之善心人士。

諮商的歷程 (process) 和結果 (outcome) 是許多對諮商有興趣者所關切的，但是若要將諮商的歷程與結果作一截然的劃分，則是不容易且很難令人滿意。在最單純形式的結果研究，它只關心個案的諮商結果；至於在最單純形式的歷程研究，它關心的是在諮商歷程的本身究竟發生了何事，它不關心諮商前／後的結果。事實上，近年幾乎所有諮商的研究，都結合了歷程和結果的成分 (Lepper & Riding, 2006)。另有學者認為，儘管先前已經有不少人試圖對諮商歷程和結果下定義，讓這兩者能更明確易懂，但是諮商歷程與結果的概念和意涵卻是經常重疊的 (Heppner, Wampold, & Kivlighan, 2008)。

過去在量化的研究上，研究者已經發展出評量諮商歷程中不同向度的工具，例如：被研究的對象 (個案、心理師、個案—心理師關係、督導者、心理師—督導者關係)、歷程的型態 (心理師或個案的外顯行為、心理師的意圖或個案反應之內隱行為)、諮商的理論基礎、評量者 (個案、心理師、督導或評判者)、評量的單位 (從單一字詞到整體諮商的評量)、評量的型式 (等距量尺、名義變項或 Q 歸類) 等 (Hill & Lambert, 2004)。

在歐美地區，過去有一份經常被用以評量諮商歷程，諮商參與者對諮商的立即影響及內隱行為的工具，即是由 Stiles (1980)，Stiles 和 Snow (1984a)，Stiles 等人 (1994)，以及 Stiles、Gordon 和 Lani (2002) 陸續發展的不同版次之晤談評量問卷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過去亦有學者認為，SEQ 是諮商歷程中，評量參與者在諮商段落 (session) 情感狀態的代表性工具之一 (Heppner et al., 2008; Mallinckrodt, 1994)。

既然 SEQ 是諮商歷程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諮商歷程的研究上，SEQ 到底應該被視為是自變項或者是依變項？在這個問題上，Stiles 等人 (1994) 做了回應，Stiles 等人認為 SEQ 在研究上可作為自變項也可作為依變項。事實上，過去 SEQ 已經被運用在許多主題的評量和研究中，且不少研究者常將 SEQ 結合諮商歷程的相關變項作探討，例如：諮商技巧與晤談感受的關係 (李偉斌、陳慶福、王智弘, 2008; Kim, Liang, & Lee, 2003; Siegel & Hilsenroth, 2013)，重要事件與晤談感受的關係 (江宛凌、陳慶福, 2008; Cummings, Slemon, & Hallberg, 1993)，晤談感受與諮商滿意的關聯 (戴谷霖, 2012; Thompson & Hill, 1993)，以及晤談感受、工作同盟與治療結果之關係 (陳慶福、王雅萱, 2018; Mallinckrodt, 1993) 等。

從文獻回顧可知，在西元 2000 年前，國外有較多探討個案與心理師所認定晤談感受一致性的研究，這些研究常發現，在諮商段落中，個案與心理師在晤談感受深度性認定的一致性上，個案的評量得分常高於心理師，但在順暢性的評量得分上則無明顯差異 (Cummings et al., 1993; Dill-Standiford, Stiles, & Rorer, 1988; Stiles & Snow, 1984a)。至於過去 SEQ 在諮商歷程和結果的探討上，以個案為對象的研究要多於心理師，而以心理師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經常發現，心理師所知覺諮商的深度性，與諮商歷程中的許多變項關係密切，例如：助人技巧與諮商的助益性 (李偉斌等人, 2008; 林瑞吉、劉焜輝, 1997; Hill et al., 1994)，及晤談感受的深度性、順暢性與工作同盟等 (Kivlighan, Marmarosh, & Hilsenroth, 2014; Vittorio, Antonello, Daniela, & Annalisa, 2011)。

此外，過去在晤談評量向度之深度性和順暢性的文獻探討之數量，則多於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之正向性與激勵性 (Stiles et al., 2002)。過去的研究也發現，在諮商初期或者在處遇成功的段落中，晤談感受的深度性經常呈現上升的趨勢 (陳斐娟, 1996; 陳慶福, 1995; Kivlighan, Angelone, & Swafford, 1991; Reynolds et al., 1996)，且個案所知覺的深度性及順暢性、諮商滿意與個案持續接受諮商有密切的關係 (Reynolds et al., 1996; Tyron, 1990)。而過去也有少數的研究發現，心理師所評量的順暢性得分，與處遇的結果有關聯 (Samstag, Batchelder, Muran, Safran, & Winston, 1998)，以及深度性結合順暢性可以顯著地預測諮商結果 (Mallinckrodt, 1993)。但是過去以個案和心理師配對，進行個案和心理師對深度性認定一致性的探討，經常發現兩者之間有所差距，但個案對晤談後帶來的放鬆、舒適感之順暢性的認定則較一致 (Dill-Standiford et al., 1988; Stiles & Snow, 1984a)。此外，過去對順暢性的評量，主要的對象則是聚焦在個案 (Stiles et al., 2002) 而非心理師。

雖然過去的研究經常顯示，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與此向度內的順暢性關係不高，但順暢性與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內的正向性，無論是在個案或心理師的評量上，皆顯示彼此的關係密切 (陳慶福、林妙容, 2016; Horvath & Marx, 1990; Stiles et al., 1994)。然而，過去國內一篇探討重要事件和晤談感受的研究，只知重要事件似乎影響個案的晤談感受，但是晤談感受在八次諮商中，無論是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或激勵性的任何一個向度，大多呈現上下波動的趨勢，個案在八

次諮商，於上述四個向度的平均得分中，係以順暢性最高，其次為深度性、正向性，得分最低的為激動性（江宛凌、陳慶福，2008）。而國內另一篇探討網路諮商和面對面各四次諮商，個案和諮商員所知覺的晤談感受和工作同盟的研究則發現，個案在四次諮商中，以深度性的得分最高，其次是正向性和順暢性，而以激動性的得分最低；至於諮商員，則以順暢性和深度性的得分最高，激動性的得分最低。有趣的是在面對面諮商部分，個案或諮商員所知覺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或激動性的得分都高於網路諮商（李偉斌等人，2008），此似乎顯示，在面對面諮商中，個案和諮商師都有較強烈的晤談感受，此研究結果也與過去 Stiles 等人（1994），以及 Stiles 和 Snow（1984b）的研究發現：個案接受諮商，同時注重諮商帶來的放鬆及舒適感的順暢性，以及諮商帶來的力量與價值之深度性的研究結果大致符合。

過去在台灣有關 SEQ 的中譯上，廖鳳池（1994）、陳慶福（1995）、王麗斐和林美珠（2000）曾先後將第三版晤談評量問卷（SEQ-3）翻譯成中文，以及進行晤談感受相關研究。上述研究者所中譯的 SEQ-3 計分和不計分的 24 個題項中，有 11 對英文字詞的中譯是一致的，其餘中譯字詞略有差異（參見表 1）。在 SEQ-3 的中文翻譯上，廖鳳池是自行中譯。陳慶福自行中譯後，再請六位專家審查及對其所中譯的字詞提出修正意見。至於在王麗斐和林美珠中譯的過程，則先將英文翻譯成中文，再由中文翻譯回英文，採相互確認中文和英文的譯詞方式進行。另在中文的譯詞上，廖鳳池是兼採形容詞和名詞的形式，而陳慶福、王麗斐和林美珠，則是如同 SEQ-3 的英文版，是採相對應的語意區分的形容詞形式呈現。

表 1 SEQ-3 的原文、中文譯者和中文翻譯對照表

SEQ-3 問卷 (Stiles & Snow, 1984a)	英文原文	譯者及中文翻譯		
		廖鳳池 (1994)	陳慶福 (1995)	王麗斐和林美珠 (2000)
"This session was:" (這次的晤談是：)	bad-good (G)	差的－好的 (S)	壞的－好的	差的－好的
	safe-dangerous (N)	安全的－危險的 (S)	安全的－危險的	安全的－危險的
	difficult-easy (S)	困難的－容易的 (S)	困難的－容易的	困難的－容易的
	valuable-worthless (D)	有價值的－無價值的 (D)	有價值的－無價值的	有價值的－無價值的
	hallow-deep (S)	表面的－深入的 (S)	表面的－深入的	表面的－深入的
	relaxed-tense (S)	輕鬆的－緊張的 (S)	輕鬆的－緊張的	放鬆的－緊張的
	unpleasant-pleasant (S)	不愉快的－愉快的 (S)	不愉快的－愉快的	不愉快的－愉快的
	full-empty (D)	豐富的－空洞的 (D)	豐碩的－空洞的	豐碩的－空洞的
	weak-powerful (D)	虛弱的－強有力的 (D)	軟弱的－有力的	軟弱的－有力的
	special-ordinary (D)	特殊的－普通的 (D)	特殊的－普通的	特殊的－普通的
	rough-smooth (S)	不順的－順暢的 (S)	不順暢的－順暢的	不順暢的－順暢的
	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S)	舒適的－不舒服的 (S)	舒服的－不舒服的	舒服的－不舒服的
	happy-sad (P)	快樂的－傷心的 (P)	快樂的－悲傷的	快樂的－悲傷的
"Right now I feel:" (現在我覺得：)	angry-pleased (P)	生氣的－愉快的 (P)	生氣的－高興的	生氣的－高興的
	active-still (A)	有進步的－停滯不前的 (A & P)	有活力的－停滯不動的	有進展的－停滯的
	uncertain-definite (P)	不能確定的－非常確定的 (A & P)	不確定的－確定的	不確定的－確定的
	involved-detached (N)	投入的－疏離的 (P)	參與的－疏離的	投入的－疏離的
	calm-excited (A)	安靜的－不安靜的 (P)	平靜的－興奮的	冷靜的－興奮的
	confident-afraid (P)	有信心的－害怕的 (A & P)	有信心的－擔心的	有信心的－害怕的
	alert-sleepy (N)	清醒的－想睡的 (P)	清醒的－困倦的	清醒的－昏頭昏腦的
	friendly-unfriendly (P)	友善的－不友善的 (P)	友善的－不友善的	友善的－不友善的
	slow-fast (A)	緩慢的－快速的 (A & P)	緩和的－快速的	緩慢的－快速的
	joyful-joyless (N)	愉快的－不愉快的 (P)	愉快的－不樂的	有活力的－平靜的
	quiet-aroused (A)	安靜的－不平靜的 (P)	寧靜的－激動的	安靜的－喚起的

註：1. (G) = global evaluation; (D) = depth; (S) = smoothness; (P) = positivity; (A) = arousal。

2. 依照 Stiles 和 Snow (1984a) 對 SEQ-3 的計分說明，在表 1 中註明為 (N) 的這五個題項是不計分，也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因素。

資料引自：陳慶福和劉嘉蕙 (2019)：中文晤談評量問卷內部結構及其信效度之探究：諮商心理師層次分析（頁 117-118）。

另在中文 SEQ-3 的信度和效度的檢驗上，廖鳳池（1994）是以中文 SEQ-3 所有計分的 19 題，和不計分的 5 題進行因素結構、各個因素間的內部相關和內部一致性的分析；陳慶福（1995）則邀請六位專家，對中文 SEQ-3 所有的題項重新進行歸類，以了解這六位專家對深度性、順暢性、

正向性和激動性題項歸類的一致性。此外，簡華玟（2006）也曾探討中文 SEQ-3 心理師版和個案版的信度。惟國內似乎無人將第四版晤談評量問卷（SEQ-4）翻譯成中文。

自從西元 2002 年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SEQ-5）在美國問世之後，此問卷已經被翻譯成德文、荷蘭文、日文等不同的語文版本，且陸續也有研究者進行不同語文 SEQ-5 的因素結構和信效度之探討，以了解不同語文版本的 SEQ-5 是否適用於不同語文的情境中。作者考量廖鳳池（1994）在中文 SEQ-3 原先計分的 19 個題項外，又外加了不計分的 5 個題項，一起進行因素結構，以及各因素間的內部相關和內部一致性探討的合理性，廖鳳池（1994）、陳慶福（1995）、簡華玟（2006）探討中文 SEQ-3 信效度的時間，距今已有一段時日，過去國內對中文 SEQ-3 的因素結構與信效度的檢驗仍不足，且國內迄今似乎無人中譯 SEQ-4，以及進行 SEQ-4 的信效度考驗。再者，陳慶福和林妙容（2016）雖然曾以焦慮依附風格之個案，進行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Chi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EQ）各因素間的相關和內部一致性的探討，但並未以一般個案探討 C-SEQ 的因素結構，因此有關 C-SEQ 信度和效度的研究仍是欠缺的。

一、SEQ-3、SEQ-4 和 SEQ-5 有何差異？

Stiles（1980）一開始發展 SEQ 時，認為評量個案在諮商晤談是「好的或差的」（good vs. bad），至少可以以個案所知覺和感受的兩個向度作評斷：（一）「有力量的和有價值的」，相對於「軟弱的和無價值的」（powerful and valuable vs. weak and worthless），以及（二）「放鬆的和舒服的」，相對於「緊張的和煩惱的」（relaxed and comfortable vs. tense and distressing），Stiles 將上述的兩個向度稱為：深度性（depth）和順暢性（smoothness）。且自從 Stiles 和 Snow（1984a）發展了 SEQ-3 以來，此問卷除了保留先前版次的深度性與順暢性，又加入評量諮商參與者（個案、心理師、評判者），在晤談後自信與清晰、高興感受的正向性（positivity），以及在諮商後感受到有活力與興奮的激動性（arousal）兩個向度。過去的若干研究則發現，心理師似乎較著重晤談的價值和力量之深度性，而個案則同時著重晤談的價值和力量之深度性，以及諮商帶來的舒適和心情放鬆的順暢性（Stiles et al., 1994; Stiles & Snow, 1984b）。若將 SEQ-3、SEQ-4 和 SEQ-5 的題項彙整成表 2，即可看出上述三個版本間有若干異同。相同的是這三個版次，幾乎都將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的題項，平均地打散在所有的向度中，每個版次的題項均採語意區分之相對應形容詞，以正向或反向七點量尺的方式計分，且此問卷可同時提供參與諮商的個案、心理師與評判者使用。

Stiles 等人（2002）在其撰寫的專文“Session Evaluation and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中，也說明 SEQ-5 和 SEQ-4 相似，SEQ-5 刪除了 SEQ-4 中三組不計分的相對應形容詞：「剛才的諮商晤談」向度（即晤談評量向度）的 safe-dangerous，和「現在我覺得」向度（即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 wakeful-sleepy、involved-detached 等三個題項，以節省問卷的空間，以及在問卷的版面上調整少數的題項順序。此外，SEQ-5 刪除了 SEQ-3 不納入計分的：safe-dangerous、alert-sleepy、joyful-joyless、involved-detached 四題，並將 SEQ-3 中的 active-still，從 SEQ-4 起改成 moving-still，以及在諮商後情感評量向度，加入 SEQ-3 中未出現，在 SEQ-4 新納入的 energetic-peaceful 題項。

表 2 SEQ-3、SEQ-4 和 SEQ-5 所包含的題項、各題項所隸屬的向度和各題項的計分方式

SEQ-3	SEQ-4	SEQ-5	計分
bad-good	bad-good	bad-good	G
safe-dangerous	safe-dangerous	safe-dangerous	N
difficult-easy	difficult-easy	difficult-easy	+S
valuable-worthless	valuable-worthless	valuable-worthless	-D
hallow-deep	shallow-deep	shallow-deep	+D
relaxed-tense	relaxed-tense	relaxed-tense	-S
unpleasant-pleasant	unpleasant-pleasant	unpleasant-pleasant	+S
full-empty	full-empty	full-empty	-D
weak-powerful	weak-powerful	weak-powerful	+D
special-ordinary	special-ordinary	special-ordinary	-D
rough-smooth	rough-smooth	rough-smooth	+S
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S
happy-sad	happy-sad	happy-sad	-P
angry-pleased	angry-pleased	angry-pleased	+P
active-still	moving-still	moving-still	-A
uncertain-definite	uncertain-definite	uncertain-definite	+P
involved-detached	involved-detached	involved-detached	N
calm-excited	calm-excited	calm-excited	+A
confident-afraid	confident-afraid	confident-afraid	-P
alert-sleepy	wakeful-sleepy	alert-sleepy	N
friendly-unfriendly	friendly-unfriendly	friendly-unfriendly	-P
slow-fast	slow-fast	slow-fast	+A
joyful-joyless	energetic-peaceful	energetic-peaceful	-A
quiet-aroused	quiet-aroused	quiet-aroused	+A

註：1. 表 2 整理自：Stiles 與 Snow (1984a)；Stiles 等人 (1994)；Stiles 等人 (2002)。

2. SEQ-3、SEQ-4 和 SEQ-5 的第一個題項"bad-good"皆是作整體評量：G = global evaluation 用途。

3. 粗黑體字代表該題項與先前版本不同，粗黑體字加刪除線代表新版本已刪除前版本之該題項。

4. 計分：(1) 向度：D = depth; S = smoothness; P = positivity; A = arousal；(2) 「+」表示正向計分，參與者圈選 1 者得 1 分，圈選 7 者得 7 分；「-」表示反向計分，圈選 1 者得 7 分，圈選 7 者得 1 分；(3) 各向度分數 = 同向度題項分數總和後除該向度的題數。N 為不計分，亦不屬任何向度。

二、SEQ 內部結構的探討

自從 Stiles (1980) 發展 SEQ 以來，在國際間已經有不少研究，是以心理師層次 (counselor-level)、個案層次 (client-level) 和諮商段落層次 (session-level)，探討 SEQ 的因素結構、各因素間的內部相關，以及內部一致性，也有具體的發現。在因素結構的探討上，過去的研究大多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近十年來開始有很少數的研究，採更嚴謹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進行 SEQ 因素結構的驗證。

另由文獻回顧可知，過去有關 SEQ-3 和 SEQ-4 因素結構的探討，大多將 SEQ 分成：晤談評量向度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兩個向度分析，這些研究多數發現，SEQ 在晤談評量向度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可以分別形成：深度性與順暢性，以及正向性與激動性四個因素的結構 (廖鳳池，1994；Stiles et al., 1994; Stiles & Snow, 1984b)。

目前在歐洲和亞洲至少有三篇研究，探討 SEQ-5 的因素結構。這當中的一篇由 Hartmann 等人 (2013) 在德國的研究，是以 26 位心理師，對社區諮商機構的 96 位個案，進行了 1,164 人次個別諮商，並收集這些樣本所填答的德文版晤談評量問卷 (SEQ-D)，採驗證性因素分析，探討 SEQ-D 的內部結構、各題項間的相關。此研究發現，德文版晤談評量問卷可以複製英文版 SEQ-5 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順暢性各 5 題，以及晤談後評量向度正向性、激動性各 5 題的四個因素結構，這四個因素中以順暢性的研究資料與測量模式的適配契合上最理想，深度性和激動性大致良好，正向性則較不理想。

至於桂川泰典、国里愛彦、菅野純與佐々木和義 (2013) 在日本對日文版晤談評量問卷 (J-SEQ) 因素結構的探討，則以 103 位心理師最近一次對個案進行個別諮商後，心理師所填的 103 份日文

版 SEQ-5，進行心理師層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英文版 SEQ-5 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順暢性各 5 題，以及晤談後評量向度的正向性、激動性各 5 題，皆可呈現在 J-SEQ 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的因素內。此研究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則顯示：日文版 SEQ-5 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的研究資料與測量模式的適配契合上大致良好。

但是 Hafkenscheid (2009) 在荷蘭以荷蘭文版 SEQ-5 所進行的研究則得到不一樣的結果。在 Hafkenscheid 的研究中，他先將 SEQ-5 翻譯成荷蘭文，以荷蘭個案 96 人，每人至少接受四次諮商，並填答四份荷蘭文晤談評量問卷，最終回收 2,074 份問卷後，分別以晤談評量向度的 10 題（深度性、順暢性各 5 題），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 10 題（正向性、激動性各 5 題），進行諮商段落層次和個案層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此研究發現，深度性的 5 題（有價值的—無價值的、表面的—深入的、豐碩的—空洞的、軟弱的—有力的、特別的—普通的），在諮商段落層次和個案層次，皆可保留 5 題在此因素；順暢性的 5 題在諮商段落層次上，可以保留 4 題（放鬆的—緊張的、不愉快—愉快的、不順暢的—順暢的、舒服的—不舒服的）在此因素，在個案層次上可以保留 3 題（放鬆的—緊張的、不愉快—愉快的、不順暢的—順暢的）在此因素。正向性的 5 題在諮商段落層次可保留 4 題（快樂的—悲傷的、生氣的—高興的、有信心—害怕的、友善的—不友善的）在此因素，在個案層次上可以保留 3 題（有信心—害怕的、生氣的—高興的、不確定的—確定的）在此因素；但是激動性 5 題在諮商段落層次僅可保留 2 題（緩慢的—快速的、有活力的—平靜的）在此因素，在個案層次也僅可以保留 2 題（緩慢的—快速的、有進展的—停滯的）在此因素。此研究另以作為整體晤談感受評量的「好的—差的」一題，晤談評量向度的 10 題，以及晤談後情感向度的 10 題，總共 21 題一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荷蘭文版 SEQ-5 最多只能形成兩個因素的結構。

另在 SEQ 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內部相關的探討上，過去以心理師層次、個案層次和諮商段落層次，進行 SEQ 四個因素的相關分析結果大多顯示，四個因素間經常未存有顯著的相關。例如 Stiles 和 Snow (1984a) 在美國以一所大學，探討心理師層次、個案層次和諮商段落層次 SEQ 四個因素相關的研究顯示，深度性與正向性、深度性與激動性，以及正向性與激動性間大多存有低度到中度顯著相關，但是深度性與順暢性，以及順暢性與激動性的題項間幾乎都無顯著相關。再者，Stiles 等人 (1994) 在英國以 218 位社區個案，總共 2,414 份 SEQ 的分析發現：在諮商段落層次和個案層次的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三個因素的內部相關介於低度到中度間，但是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三個因素與激動性間未存有顯著相關。

此外，桂川泰典等人 (2013) 在日本以 103 位心理師，進行日文版 SEQ-5 心理師層次的分析發現，深度性與正向性間為低度相關、深度性與激動性為低度相關、順暢性與正向性間為中度相關，但是深度性與順暢性、順暢性與激動性，以及正向性與激動性之間則無顯著相關。至於 Hafkenscheid (2009) 在荷蘭以荷蘭文的 SEQ-5，進行諮商段落層次和個案層次的研究則發現，深度性與正向性、激動性，正向性與激動性間均未有顯著相關。此外，Hartmann 等人 (2013) 在德國以個案和心理師的研究則發現：SEQ-D 的各題項間大多存在低度到中度顯著相關。相較於上述不同語文和研究對象的研究，過去在台灣也有兩篇，分別以中文第三版和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進行四個因素間相關的探討。廖鳳池 (1994) 以台灣的 87 位大學生個案的研究發現，中文第三版晤談評量問卷四個因素間的相關係數介於中高度相關；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以台灣的 77 位焦慮依附風格大學生個案進行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 (C-SEQ) 四個因素相關的分析，也發現四個因素間存有中高度的相關。

另在過去，已經有不少研究針對個案和心理師對 SEQ 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的認定一致性作探討，這些研究大多發現，個案和心理師在上述四個因素的認定經常存有低度到中度的相關，但是在諮商初期的段落，心個案和心理師在四個因素的認定上，往往有較大的差異 (Mallinckrodt, 1993; Stiles, Shapiro, & Firth-Cozens, 1988; Stiles & Snow, 1984a)。此外，過去在 SEQ 四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探討大多顯示，在不同的語文或情境，SEQ 大多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陳慶福、林妙容, 2016; 廖鳳池, 1994; 簡華姣, 2006; 桂川泰典等人, 2013; Reynolds et al., 1996; Stiles et al., 1994; Stiles et al., 1988; Stiles & Snow, 1984b)。但是 Hafkenscheid (2009) 在

荷蘭的研究結果可能是個例外，此研究發現在荷蘭文版 SEQ 中，激動性因素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僅 .13。

小結：綜合上述，若以 SEQ 在不同語文版本和不同研究對象，進行個案層次、心理師層次或諮商段落層次的因素分析，結果皆顯示 SEQ-3 和 SEQ-4 在晤談評量向度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分別包含：深度性、順暢性，以及正向性、激動性四個因素的結構。至於在 SEQ-5 的因素分析上，Hartmann 等人（2013）在德國以個案和心理師為研究對象，以及桂川泰典等人（2013）在日本以心理師為對象的研究也發現，SEQ-5 在晤談評量向度和晤談後情感向度，分別包含：深度性、順暢性，以及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且這四個因素各自包含 5 個題項。但是 Hafkenscheid（2009）在荷蘭以個案層次和諮商段落的研究則顯示，荷蘭文版 SEQ-5 雖然在晤談評量向度包含：深度性與順暢性兩個因素，但是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只包含：正向性一個因素。再者，過去國外以個案層次、心理師層次或諮商段落層次，所進行不同版次 SEQ-5 四個因素間相關的探討則顯示，這四個因素間未必存有顯著相關。但是過去在台灣，廖鳳池（1994）以一般大學生個案，進行第三版中文晤談評量問卷，以及陳慶福和林妙容（2016）以焦慮依附大學生個案，進行 C-SEQ 四個因素間相關的分析則發現，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間呈現中高度相關，且過去國內外的研究亦顯示，無論是 SEQ-3、SEQ-4 或 SEQ-5，幾乎都具有中高度或高度的內部一致性。由此可知，過去以個案層次所進行 SEQ 因素結構、內部相關或內部一致性之探討之發現，和過去以心理師或諮商段落層次探討的發現並無太大差異；有較大差異的地方在於，個案與心理師在諮商初期，對晤談感受知覺的一致性之評量，特別是對深度性的知覺的認定上；以及個案與心理師對晤談感受知覺的一致性，與諮商歷程中若干變項和諮商結果間的關係（例如：晤談感受與工作同盟、晤談感受與諮商結果等）。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 C-SEQ 的內部結構，以及確認此問卷在國內，是否適用於評量個案在每次或不同階段的諮商段落，作為評量個案立即影響的諮商實務用途。

方法

一、參與者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間，至台灣北、中、南、東部的 21 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接受心理師個別諮商，了解本研究之目的，且願意協助在最近一次接受心理師的個別諮商後，立即填答一份中文晤談評量問卷（C-SEQ）之大學生個案 200 位（ $N = 200$ ）。

二、研究工具－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SEQ-5）

本研究採用陳慶福和林妙容（2016）翻譯自 Stiles 等人（2002）發展的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Form 5, SEQ-5）為研究工具。Stiles 等人說明 SEQ-5 的填答說明、問卷的使用和計分方式如下：

首先，Stiles 等人在 SEQ-5 所有 21 個語意區分的相對形容詞（Semantic Differential Style），及以正向或反向形容詞呈現之 7 點量表問卷上面註明：「請圈選出一個適當的阿拉伯數字來代表你感受到的這次諮商」。在問卷的使用上，SEQ-5 如同先前的版本，是可同時提供個案和心理師使用的同一版本。此問卷由相對應的語意區分形容詞所組成。SEQ-5 共有 21 個題項，採其中的 20 題計分。不計分的第一個題項「差的－好的」（bad-good）在個案和心理師的運用上經常是不同的（Stiles & Snow, 1984b）；對心理師而言，這個題項在因素分析上經常隸屬在深度性內；但是在個案的因素分析則常跨深度性和順暢性兩個因素，至於「差的－好的」這個題項之所以保留在 SEQ-5 內，主要是因為此題項在 SEQ-5 中，可以作為此問卷整體評量的好處。

SEQ-5 評量「剛才的諮商晤談」即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 (depth) 和順暢性 (smoothness) 10 題, 以及評量「諮商晤談後」即晤談後情感評量的正向性 (positivity) 和激動性 (arousal) 10 題。在 SEQ-5 晤談評量的深度性和順暢性, 以及晤談後情感的正向性和激動性, 是以上述四個因素所包含的題項之平均得分計算。SEQ-5 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和順暢性, 以及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和激動性的題項順序, 是採混合題項, 以及將各向度的題數, 以接近平均題數分配在各自的向度, 此外 SEQ-5 被設計為正反向計分的題數也非常接近, 且每一個正向題的計分都是從 1 到 7, 反向題則是從 7 到 1, 填答者在 SEQ-5 的得分越高, 表示填答者在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或激動性的感受越深刻。SEQ-5 在各向度得分的呈現上, 主要是以各向度題項的平均分數為各向度得分的指標, 較不採各向度的總分, 這樣的作法可以讓 SEQ-5 在解釋上較為容易些。

雖然 Stiles 等人 (2002) 發展了 SEQ-5, 也說明了 SEQ-5 的填答說明、用途和計分方式, 但是 Stiles 等人並未提供此問卷的內部結構資料。過去國外至少已經有三篇研究探討過 SEQ-5 內部結構, 這當中有兩篇研究顯示 SEQ-5 具有深度性 (depth)、順暢性 (smoothness)、正向性 (positivity) 和激動性 (arousal) 四個因素的結構, 以及此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桂川泰典等人, 2013; Hartmann et al., 2013)。但是 Hafkenscheid (2009) 的研究則顯示, 荷蘭文版 SEQ-5 在晤談評量向度包含深度性和順暢性兩個因素, 但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 只包含正向性一個因素。

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在中譯 SEQ-5 的程序上, 首先對照及參考先前曾將 SEQ-3 翻譯成中文版本的廖鳳池 (1994)、陳慶福 (1995) 以及王麗斐和林美珠 (2000) 的中文譯詞, 仔細閱讀 SEQ-3 和 SEQ-5 兩個版所有題項的原文後, 形成 SEQ-5 中譯版本。作者邀請最近三個月內曾經接受個別諮商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各一位, 填答作者中譯的 SEQ-5, 這兩位填答者均表示問卷的字詞上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填答順利, 約 3-4 分鐘可完成問卷的填答。經過上述的程序, 作者再邀請一位曾經翻譯過 SEQ-3 原文的諮商領域博士, 審視作者的中文譯詞, 該專家表示作者的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 (C-SEQ) 的譯詞沒問題, 無須修改。

至於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以台灣 9 所大學, 接受第三次諮商的焦慮依附風格大學生個案 77 人, 進行 C-SEQ 的內部一致性, 和內部相關的探討, 則發現此問卷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分別為 .88、.92、.92 和 .79, 整體問卷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95 ($p < .001$); 四個因素的內部相關介於 .55 至 .72 間 ($p < .001$), 顯示 C-SEQ 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以及此問卷的四個因素間存有中高度的相關。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參考 Stiles 等人 (2002) 對 SEQ-5 概念和計分的說明, 以及參考過去 Hartmann 等人 (2013) 在德國, 以及桂川泰典等人 (2013) 在日本因素分析的作法, 先將本研究所收集的大學生個案 $N = 200$, 所填答的 200 份 C-SEQ 加以計分, 再將問卷分成晤談評量向度 10 題, 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 10 題,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及求取各因素間的相關和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接續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得的因素和題數,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確認中文第五版晤談評量問卷的因素結構。

四、研究程序

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在 2014 年 8 月中旬獲得 W. B. Stiles 提供的英文版 SEQ-5 後, 先參考國內先前的譯者對 SEQ-3 的中文譯詞, 再進行 C-SEQ 的中譯。之後邀請曾經翻譯過中文版 SEQ-3 的一位諮商領域博士審視作者的中文譯詞, 以及提供文辭的修正意見; 待上述工作完成後, 作者連絡台灣各大學之諮商輔導中心, 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及行政程序, 待確定願意協助本研究之大學校院諮商輔導中心 21 所後, 採親自送達或以郵寄邀請函、研究說明書及問卷, 至願意協助本研究之機構, 請該機構行政人員代為邀請正在接受個別諮商, 且有意願協助問卷調查的大學生個案參與本研究。

作者在邀請可能參與者的邀請函上，說明研究的目的，資料的處理與應用，並附上研究者的姓名、身分、聯絡方式，本研究資料如何運用，並註明當可能的參與者如果對本研究有任何不清楚，或者需要作者進一步說明的地方，作者會盡快與可能的參與者聯絡，以及做必要的回覆和說明。在本研究中，可能的參與者在簽署研究同意書，及在接受最近的一次個別諮商後，完成 C-SEQ 的填答者，即為本研究的參與者。參與者在最近一次接受個別諮商及填答完問卷後，直接將問卷放入空白的信封內且彌封，轉交給各校行政人員放入收集問卷的專用大牛皮紙袋內，各校行政人員在研究期間結束時，將其收集的問卷統一寄回給作者。除了上述的倫理考量，以保護參與者的隱私，在本研究進行期間提供參與者諮商的諮商輔導中心所有人員，均不知參與者所填答問卷的計分方式及得分情形。

結果

以下依序說明本研究的敘述統計、C-SEQ 探索性因素分析、C-SEQ 四個因素的內部相關、C-SEQ 內部一致性，以及 C-SEQ 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

一、敘述統計

參與者 $N = 200$ 中，女性 128 人（占 64%），男性 69 人（占 34.5%），未註明者 3 人（占 1.5%），年齡以 18-23 歲者最多，共有 148 人（占 74%）；參與者求助諮商的問題類型以複選的方式勾選，參與者的問題類型以自我了解最多，有 114 人次（占 57%），其次為情緒困擾 90 人次（占 45%）及人際困擾 87 人次（占 43.5%）。此外，參與者接受調查時的諮商次數，以 3 次（含）以下者最多，有 57 人（占 28.5%）；4-6 次者其次，有 49 人（占 24.5%）；7-10 次者有 28 人（占 14%），而接受 11-20 次諮商者有 27 人（占 13.5%）；接受 21 次諮商次數以上者有 24 人（占 17%）。

二、C-SEQ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首先以蒐集的 C-SEQ 共 200 份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取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萃取因素，並使用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s）最大變異分析 C-SEQ 的因素結構，將保留因子規準設定為特徵值大於 1 及因素負荷量大於 .40（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本研究參考 Stiles 等人（2002）對 SEQ-5 的計分建議，以及 Stiles 等人（1994）和 Hafkenscheid（2009）分別以：（一）晤談評量（Session evaluation）向度，和（二）晤談後情感評量（Session mood evaluation）向度兩部分進行分析。

首先，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分析結果發現：「表面的-深入的」的因素負荷量橫跨兩個因子，分別為-.39 與 .40，故予以刪除。保留的 9 題重新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KMO）為 .81（ $p < .001$ ），顯示本筆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aiser, 1974）。本研究重新分析後的晤談評量向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顯示晤談評量向度包含：深度性與順暢性兩個因素，因素負荷量介於 .50 至 .77 間，惟「軟弱的一有力的」1 題落入順暢性因素，遂將其改隸屬於順暢性因素，是此，深度性因素有 3 題：「有價值的一無價值的」、「豐碩的一空洞的」、「特別的一普通的」；順暢性因素有 6 題：「軟弱的一有力的」、「困難的一容易的」、「放鬆的一緊張的」、「不愉快的一愉快的」、「不順暢的一順暢的」、「舒服的一不舒服的」，兩個因素各別的解釋變異量為 31.03%、18.29%，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49.32%。

表 3 晤談評量向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N = 200$)

晤談評量 (Session evaluation)	1	2	共同性
深度性 (Depth)			
有價值的—無價值的 (valuable-worthless)	0.14	0.53	0.30
表面的—深入的 (shallow-deep)	-	-	-
豐碩的—空洞的 (full-empty)	0.24	0.77	0.64
軟弱的—有力的 (weak-powerful)	0.50	0.27	0.32
特別的—普通的 (special-ordinary)	0.07	0.65	0.43
順暢性 (Smoothness)			
困難的—容易的 (difficult-easy)	0.71	-0.12	0.52
放鬆的—緊張的 (relaxed-tense)	0.57	0.23	0.38
不愉快的—愉快的 (unpleasant-pleasant)	0.75	0.27	0.64
不順暢的—順暢的 (rough-smooth)	0.74	0.16	0.58
舒服的—不舒服的 (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0.72	0.34	0.63
特徵值 $\lambda_1 = 3.89$; $\lambda_2 = 1.53$			
因素 1 變異量 = 31.03%、因素 2 變異量 = 18.29%、總累積變異量 = 49.32%			

再者，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顯示，KMO 值為 .82 ($p < .01$)，同樣適合進行因素結構之探究 (Kaiser, 1974)，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可知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包含：正向性與激動性兩個因素，其因素負荷量介於 .47 至 .79，故 10 道題目全數保留。惟「有進展的—停滯的」1 題在正向性因素負荷量較高，遂將其改隸屬於正向性因素。是此，正向性有 6 題：「快樂的—悲傷的」、「生氣的—高興的」、「不確定的—確定的」、「有信心的一害怕的」、「友善的—不友善的」、「有進展的—停滯的」；激動性有 4 題：「冷靜的—興奮的」、「緩慢的—快速的」、「有活力的—平靜的」、「安靜的—喚起的」，兩個因素各別的解釋變異量為 29.46%、14.64%，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44.10%。

表 4 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N = 200$)

晤談後情感評量 (Postsession mood evaluation)	1	2	共同性
正向性 (Positivity)			
快樂的—悲傷的 (happy-sad)	0.77	0.01	0.59
生氣的—高興的 (angry-pleased)	0.79	0.12	0.64
不確定的—確定的 (uncertain-definite)	0.57	0.28	0.41
有信心的一害怕的 (confident-afraid)	0.71	-0.11	0.52
友善的—不友善的 (friendly-unfriendly)	0.60	0.00	0.36
激動性 (Arousal)			
有進展的—停滯的 (moving-still)	0.60	0.06	0.36
冷靜的—興奮的 (calm-excited)	0.08	0.47	0.23
緩慢的—快速的 (slow-fast)	0.09	0.63	0.41
有活力的—平靜的 (energetic-peaceful)	0.38	0.47	0.37
安靜的—喚起的 (quiet-aroused)	0.09	0.71	0.54
特徵值 $\lambda_1 = 3.68$; $\lambda_2 = 1.85$			
因素 1 變異量 = 29.46%、因素 2 變異量 = 14.64%、總累積變異量 = 44.10%			

三、C-SEQ 的內部相關與內部一致性

C-SEQ 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之內部相關如表 5。由表 5 可知，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為中度正相關 ($r_s = .38, .42, .67, p_s < .001$)；激動性與順暢性、正向性為低度正相關 ($r_s = .16, .27, p_s < .028$)，與深度性則無顯著相關 ($r = .13, p = .077$)。

另一方面，作者分析 C-SEQ 各因素與整體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結果如表 6 所示，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68、.84、.84 和 .66，總問卷則為 .87。根據 Wortzel (1979) 針對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提出以下標準，其認為大於 .70，表示信度高，介於 .70 和 .35 則屬尚可，低於 .35 為偏低的信度。對照本研究結果，順暢性、正向性及整體問卷的信度皆相對理想，而深度性和激動性雖然相對較低，仍在可接受的範圍，顯示 C-SEQ 各因素與整體問卷具有中高度的測量信度。

表 5 C-SEQ 四個因素之內部相關 ($N = 200$)

	深度性	順暢性	正向性	激動性
深度性	-			
順暢性	.38**	-		
正向性	.42**	.16*	.27**	
激動性	.13			-

* $p < .05$. ** $p < .01$.

表 6 C-SEQ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N = 200$)

向度	題數	Cronbach's α
深度性	3	.68
順暢性	6	.84
正向性	6	.84
激動性	4	.66
整體問卷	19	.87

四、C-SEQ 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一) 晤談評量向度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證 C-SEQ「晤談評量」中之因素結構，是否與實際蒐集數據適配。為了建置最佳模式，作者根據 Noar (2003) 建議的方式，使用驗證性分析技術進行競爭模式檢定以建置最佳模式，包括：虛無模式 (null model)、單因素模式 (one-factor model)、多因素直交模式 (uncorrected factors model)、多因素斜交模式 (corrected factors model)，及階層模式 (hierarchical model)，各模式的適配性指標如表 7 所示。

模式的適配度檢驗係由絕對適配度、相對適配度及精簡適配度等三方面進行評估 (Bagozzi & Yi, 1988)。多因素斜交模式與二階單因素模式在 GFI、AGFI、RMR、RMSEA、NC 等指標相對優於其他競爭模式，進一步比較多因素斜交模式與二階單因素模式。多因素斜交模式在 AGFI、PGFI、PNFI、RFI 等指標皆優於二階單因素模式，因此作者選擇多因素斜交模式為建構 C-SEQ 之晤談評量最佳模式。該模式之絕對適配度：GFI 為 .90、AGFI 為 .83、SRMR 為 .07、RMSEA 為 .12；相對適配度：NFI 為 .90、RFI 為 .86、CFI 為 .92；精簡適配度：NC 為 3.80、PGFI 為 .52、PNFI 為 .65，根據 Kline (1998) 所述規準，絕對適配度之 AGFI 大於 .80 (Sharma, 1995)。PGFI、PNFI 高過標準值 (.50) (Byrne, 2001)，顯示本模式適配度大致可接受。

表 7 晤談評量向度的競爭模式整體適配摘要表

	判斷規準	虛無模式	單一因素模式	多因素直交模式	多因素斜交模式	二階單因素模式
整體適配度指標						
χ^2	-	1053.40	183.72	130.25	98.75	108.71
df	-	36.00	27.00	27.00	26.00	25.00
GFI	> 0.9		.83	.87	.90	.90
AGFI	> 0.9		.72	.79	.83	.82
SRMR	< 0.05		.10	.17	.07	.07
RMSEA	< 0.08		.17	.14	.12	.12
相對適配度指標						
NFI	> 0.9		.83	.86	.90	.90
RFI	> 0.9		.78	.81	.86	.85
CFI	> 0.9		.85	.88	.92	.92
精簡適配度指標						
NC	< 5.0		6.80	4.82	3.80	4.35
PGFI	> 0.5		.50	.52	.52	.50
PNFI	> 0.5		.62	.64	.65	.62

註：Chi-square (χ^2) Degrees of Freedom (df),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Standar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Normed Fit Index (NFI), Relative Fit Index (R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Normed Chi-square (NC),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除此之外，各觀察變項對應其各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 (λ) 介於 .61 與 .86，觀察變項信度介於 .37 至 .74， t 值高於臨界值 ($ts > 15.87$)，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評鑑指標 (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顯示觀察變項皆能反應其所建構之潛在變項，結果如表 8 所示。再則，各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介於 .79 及 .88，符合組成信度為「.60 以上」的評鑑標準 (Bagozzi & Yi, 1988)，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57 至 .54，皆符合評鑑標準 (.50)，表示本模式各個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對應情形良好。

表 8 晤談評量向度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	編號	題目	標準化參數值	測量誤差	t	觀察變項信度	組合信度	變異萃取估計量
深 度 性	1	有價值的－無價值的	.65	.57	17.43	.42	.79	.57
	3	豐碩的－空洞的	.83	.31	24.31	.69		
	5	特別的－普通的	.76	.42	21.37	.58		
順 暢 性	4	軟弱的－有力的	.61	.63	15.87	.37	.88	.54
	6	困難的－容易的	.73	.47	20.07	.53		
	7	放鬆的－緊張的	.68	.54	18.18	.46		
	8	不愉快的－愉快的	.86	.27	25.37	.74		
	9	不順暢的－順暢的	.74	.45	20.37	.55		
	10	舒服的－不舒服的	.78	.39	21.93	.61		

(二) 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檢證 C-SEQ 中「晤談後情感評量」之因素結構，是否與實際蒐集數據契合。為了深入探討因素結構，作者根據 Noar (2003) 建議的方式，使用驗證性分析技術進行競爭模式檢定以建置最佳模式，包括：虛無模式 (null model)、單因素模式 (one-factor model)、多因素直交模式 (uncorrected factors model)，及多因素斜交模式 (corrected factors model)，透過比較四個模式適配度指標選出最簡約模式為最終模式。各模式指標詳見表 9。

模式適配度檢驗包括絕對適配度、相對適配度及精簡適配度估 (Bagozzi & Yi, 1988)。由表 9 可知，多因素斜交模式在 AGFI、RMSEA、RFI、NC、PGFI、PNFI 等指標相對優於其他競爭模式，故本研究選擇多因素斜交模式建構晤談後情感評量之模式。該模式之絕對適配度：GFI 為 .92、AGFI

為 .87、SRMR 為 .09、RMSEA 為 .09；相對適配度：NFI 為 .91、RFI 為 .88、CFI 為 .94；精簡適配度：NC 為 2.66、PGFI 為 .57、PNFI 為 .69。根據模式評鑑規準（Kline, 1998），本模式在絕對適配度（GFI、AGFI）、相對適配度（NFI、CFI）、精簡適配度（NC、PGFI、PNFI）部分符合規準（Byrne, 2001; Joreskog & Sorbom, 1982; Sharma, 1995），顯示整體模式具有相對良好的適配度。

表 9 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競爭模式整體適配摘要表

	判斷規準	虛無模式	單一因素模式	多因素直交模式	多因素斜交模式	二階單因素模式
整體適配度指標						
χ^2	-	979.20	190.40	97.28	90.59	91.02
df	-	45.00	35.00	35.00	34.00	33.00
GFI	> 0.9		.84	.91	.92	.92
AGFI	> 0.9		.75	.86	.87	.86
SRMR	< 0.05		.11	.12	.09	.09
RMSEA	< 0.08		.15	.10	.09	.09
相對適配度指標						
NFI	> 0.9		.83	.89	.91	.91
RFI	> 0.9		.78	.86	.88	.87
CFI	> 0.9		.86	.93	.94	.94
精簡適配度指標						
NC	< 5		5.44	2.78	2.66	2.76
PGFI	> 0.5		.53	.58	.57	.55
PNFI	> 0.5		.65	.70	.69	.67

註：Chi-square (χ^2) Degrees of Freedom (df),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Standar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Normed Fit Index (NFI), Relative Fit Index (R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Normed Chi-square (NC),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另一方面，表 10 顯示各觀察變項對其各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 (λ) 介於 .50 與 .75，觀察變項信度皆高於 .25， t 值均達顯著 ($ts > 12.91$)，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的評鑑指標 (Hair et al., 1998)。再者，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分別為 .80 與 .78，符合規準 (.60) (Bagozzi & Yi, 1988)；但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0 至 .47，未達評鑑標準 (.50)。

表 10 晤談後情感評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	題號	題目	標準化參數值	測量誤差	t	觀察變項信度	組合信度	變異萃取估計量
正向性	11	快樂的－悲傷的	.56	.69	14.48	.31	.80	.40
	12	生氣的－高興的	.50	.75	12.91	.25		
	13	不確定的－確定的	.61	.63	16.11	.37		
	14	有信心的－害怕的	.68	.53	18.69	.46		
	15	友善的－不友善的	.74	.45	20.66	.55		
	16	有進展的－停滯的	.66	.56	17.89	.44		
激勵性	17	冷靜的－興奮的	.56	.69	14.87	.31	.78	.47
	18	緩慢的－快速的	.72	.48	20.53	.52		
	19	有活力的－平靜的	.75	.43	21.80	.56		
	20	安靜的－喚起的	.69	.52	19.49	.48		

討論與建議

以下作者依據本研究的發現進行討論，提出本研究之限制，並對本研究的發現，如何應用於未來的諮商實務以及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一、研究結果之意涵

過去國外在 SEQ-5 內部結構的探討上，Hartmann 等人（2013）在德國以個案和心理師為研究對象，以及桂川泰典等人（2013）在日本，以心理師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德文版和日文版 SEQ-5 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包含 5 題（有價值的—無價值的、表面的—深入的、豐碩的—空洞的、軟弱的—有力的、特別的—普通的），在順暢性包含 5 題（困難的—容易的、放鬆的—緊張的、不愉快的—愉快的、不順暢的—順暢的、舒服的—不舒服的）；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包含 5 題（快樂的—悲傷的、生氣的—高興的、不確定的—確定的、有信心的—害怕的、友善的—不友善的），激動性包含 5 題（有進展的—遲滯的、冷靜的—興奮的、緩慢的—快速的、有活力的—平靜的、安靜的—喚起的）。倘若將 C-SEQ 的因素結構與 Hartmann 等人在德國，以及桂川泰典等人。在日本的研究發現做比較可知，C-SEQ 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因素包含 3 題（有價值的—無價值的、豐碩的—空洞的、特別的—普通的），少了因素負荷量過低的「表面的—深入的」一題，和隸屬於順暢性的「軟弱的—有力的」的一題；C-SEQ 在順暢性因素包含 6 題（軟弱的—有力的、困難的—容易的、放鬆的—緊張的、不愉快的—愉快的、不順暢的—順暢的、舒服的—不舒服的），這 6 題中的「軟弱的—有力的」這一題，在德國和日本的研究中，是落入深度性的因素。C-SEQ 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因素包含 6 題（快樂的—悲傷的、生氣的—高興的、不確定的—確定的、有信心的—害怕的、友善的—不友善的、有進展的—停滯的），其中「有進展的—停滯的」這一題在德國和日本的研究中，是隸屬在激動性的因素內；C-SEQ 在激動性因素包含 4 題（冷靜的—興奮的、緩慢的—快速的、有活力的—平靜的、安靜的—喚起的）；而「有進展的—停滯的」這一題，在德國和日本的研究中，皆隸屬在激動性的因素，在本研究，「有進展的—停滯的」這一題，則落入正向性的因素內。

再者，C-SEQ 與德文版和日文版 SEQ-5 的研究皆發現，這三種語文版本都包含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和順暢性，以及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不同的地方在於 C-SEQ 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與順暢性包含的題數和內涵，以及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題數和內涵有所差異。至於 Hafkenscheid（2009）在荷蘭以諮商段落層次和個案層次的分析則發現，在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無論是諮商段落層次或個案層次皆可以包含 5 題，在諮商段落層次的順暢性可包含 4 題，個案層次可包含 3 題；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諮商段落層次可包含 4 題，個案層次可包含 3 題，但是在諮商段落層次或個案層次，皆無法形成激動性的因素。作者推估造成 C-SEQ 與德文版和日文版，以及與荷蘭文版 SEQ-5，在題數或因素內涵有所差異的原因，可能來自：調查對象之特性、個案對諮商的期望、在文化上來自不同地區的樣本對不同語文題項的知覺和感受之差異，或者來自調查時間的不同等原因。

本研究對 C-SEQ 所進行的驗證性分析，係以本研究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之晤談評量向度深度性的 3 題、順暢性的 6 題，和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正向性的 6 題、激動性的 4 題，亦即以晤談評量向度的 9 題，和晤談後情感評量 10 題，分成兩部分進行驗證性分析，結果顯示在晤談評量向度深度性 3 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5 至 .83 間，順暢性 6 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1 至 .86 間；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 6 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0 至 .78 間；激動性 4 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6 至 .75 間。C-SEQ 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亦顯示，無論在晤談評量向度或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在絕對適配度、相對適配度和精簡適配度，有半數的適配指標是符合要求的。本研究在 C-SEQ 信度的檢驗上，則顯示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順暢性，以及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激動性皆有理想的組合信度。在平均變異抽取量上，是以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和順暢性較理想。

此外，本研究在 C-SEQ 四個因素內部相關的探討發現，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三者間存有中度相關；激動性與順暢性、正向性為低度相關，但是激動性與深度性則無顯著相關。過去 Stiles 等人（1994）在英國的研究發現，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三者間存有低度相關，而深度性與激動性之間未存顯著相關，本研究對 SEQ 四個因素內部相關的發現，與 Stiles 等人的發現相近，此現象似乎反映出個案在諮商後所知覺到放鬆及舒適之順暢性，與知覺到自信、清晰和高興程度感受之正向性的關係存有中度的關係；而個案所知覺諮商是否帶來力量及價值之深度性，與個案在諮商後知覺到諮商帶來的活力和興奮之激動性兩者間關聯性不明顯，是無顯著相關；而個案在諮

商後所知覺諮商帶來的活力和興奮之激動性，也與個案在諮商後知覺到放鬆及舒適之順暢性，以及自信、清晰和高興程度之正向性的關係不大，是低度顯著相關，因此激動性在 C-SEQ 四個因素中，似乎與其他三個因素在內涵上有較大的差異。

過去國外在 SEQ 四個因素內部相關的探討上，經常發現 SEQ 的四個因素未必存有顯著相關，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去國外 Stiles 和 Snow (1984b)、Stiles 等人 (1994)、Hartmann 等人 (2013) 在德國，以及桂川泰典等人 (2013) 在日本的發現有類似現象。但本研究以 C-SEQ 進行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內部相關的研究發現，則與過去國內廖鳳池 (1994) 以一般大學生個案所進行中文第三版晤談評量問卷的調查發現，中文第三版晤談評量問卷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間，以及陳慶福和林妙容 (2016) 以焦慮依附風格的大學生個案為調查對象的研究時發現，C-SEQ 的四個因素存有中高度相關有差異。作者認為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可能與個案對 C-SEQ 的主觀知覺和感受、調查的時間、個案接受調查時的諮商階段、個案的問題類型與問題嚴重性，以及心理師與個案的互動，或在問卷調查時，個案受到諮商外環境因素影響等有關。

本研究在 C-SEQ 內部一致性的探討則顯示，C-SEQ 四個因素具有中高度的內部一致性，以及整體問卷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去國內外的研究發現趨近一致 (陳慶福、林妙容, 2016; 廖鳳池, 1994; 簡華玟, 2006; 桂川泰典等人, 2013; Hartmann et al., 2013; Stiles et al., 1994; Stiles & Snow, 1984b)，雖然一般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經常具有樣本依賴的特性，本問卷也不例外、本研究和過去許多對 SEQ 內部一致性的研究顯示，不同版次、跨越不同語文和研究對象的 SEQ，幾乎都具有良好的信度。

作者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探討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發現及確認個案層次 C-SEQ 的內部結構，至於 C-SEQ 的品質為何？未來是否可加以應用？作者認為，個案層次的 C-SEQ 包含：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順暢性，以及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正向性、激動性共四個因素，作者綜合 C-SEQ 內部結構的分析結果，認為 C-SEQ 在信度和效度上並非理想，應是屬於可接受的品質。本研究是國內對 C-SEQ 內部結構的初步探討，有鑑於在國外，不同版次的 SEQ，已經被廣泛應用於諮商實務和諮商歷程或結果研究，但國內目前仍欠缺評量個案在接受諮商後立即影響的工具。作者認為 C-SEQ 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國內心理師，作為評量個案在接受諮商後，諮商對晤談感受的深度性、順暢性、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向度之立即影響的工具，其次才是作為諮商歷程和結果的研究用途。

二、限制

本研究顯示個案層次的 C-SEQ，在晤談評量向度，以及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分別包含：深度性和順暢性，以及正向性和激動性四個因素。C-SEQ 的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間為中度正相關；激動性與順暢性、正向性為低度正相關，激動性與深度性則無顯著相關。此外，C-SEQ 的四個因素，具有中高度的內部一致性，整體問卷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經由 C-SEQ 內部結構之探討可知，C-SEQ 的品質是可接受的，由於本研究是對 C-SEQ 內部結構的初步探討，因此在未來 C-SEQ 仍需要更多的檢驗。

本研究有三項主要的限制。首先，本研究係以個案在本研究進行時的最近一次個別諮商後，進行研究資料的收集，並進行個案層次 C-SEQ 因素結構與信度和效度的分析，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個案的特質、個案對諮商的期望、文化上的差異、個案問題的嚴重性、諮商的階段或個案實際填寫 C-SEQ 的時間等之影響。其次為，本研究並未收集心理師的資料，採取心理師-個案配對的方式收集資料及分析，以及同時提供 C-SEQ 的個案層次、心理師層次和諮商段落層次的內部結構資料。最後則是，雖然本研究已從台灣不同地區收集了 200 份參與者的研究資料，進行 C-SEQ 內部結構的分析，但是研究資料似乎仍較少，此可能影響到 C-SEQ 內部結構的分析結果。

三、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的發現以及本研究的限制，提出對未來諮商實務，以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對諮商實務的建議

作者認為 C-SEQ 在未來，主要應用在諮商實務上，至於未來要如何運用 C-SEQ，或者進行 C-SEQ 的計分和解釋呢？作者認為往後的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可使用 C-SEQ 作為個案層次諮商段落晤談評量的回饋工具。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可以以個案在不同的諮商段落或諮商階段，進行 C-SEQ 的評量，了解個案在晤談評量向度所知覺和感受到，在諮商後對諮商的力量與價值之深度性的感受，和諮商帶來的放鬆和愉悅之順暢性的感受；以及個案在諮商後，在晤談後情感評量向度的感受，亦即個案在諮商後對諮商後的友善、信心和進展之正向性的感受，以及在諮商後覺得有活力和興奮感之激動性感受。心理師和諮商實務工作者可以以 C-SEQ 的兩個向度內的各兩個因素所有的題數之平均分數，以及每一個題項的得分，了解個案對諮商的知覺和感受，並在不同的諮商階段或段落中，了解個案在 C-SEQ 的得分情形。此外，心理師或問卷解釋者如果需要對個案解釋 C-SEQ 的得分情形，宜說明 C-SEQ 主要的用途，此問卷的初步發現的信度和效度，以及此問卷的適用性和限制。

至於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要如何看待及運用 C-SEQ 的內部相關資料？本研究發現 C-SEQ 的深度性、順暢性與正向性因素間存在低度至中度的相關，深度性與激動性無相關。此現象似乎告訴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除了要以晤談評量向度的深度性和順暢性，以及晤談後情感向度的正向性和激動性分成兩個部分，來了解個案在此問卷的晤談感受外，也應特別注重個案所知知覺的諮商力量 and 價值之深度性感受，其次才是個案知覺的放鬆、舒適之順暢性，以及和順暢性關係密切，在諮商後知覺到自信、清晰和高興之正向性，以及個案對諮商覺得有活力和興奮感程度之激動性感受。此外，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可善用 C-SEQ 作為諮商整體評量用的「差的一好的」第一個題項，了解個案對某特定諮商或某諮商階段在 C-SEQ 兩個向度和四個因素的整體感受。

再者，心理師或諮商實務工作者，除了可以主動邀請個案在某諮商段落（或某幾次諮商段落）或不同的諮商階段填答 C-SEQ 外，也可自行填答 C-SEQ，並和個案分享彼此在 C-SEQ 的得分情形，此作法對個案和心理師彼此對諮商段落歷程的知覺和感受的核對，以及對諮商後續的進行皆將有所助益。最後，諮商的督導者，可以運用個案、心理師對某諮商段落或者持續的諮商段落後填答的 C-SEQ，進行心理師的督導，增進心理師對諮商歷程的覺察，透過心理師對諮商歷程中與個案的互動及其對諮商之影響的重新審視，心理師得以進一步了解自身在諮商歷程之行為表現，增進心理師對諮商歷程的掌握，提升心理師對個案的正面影響。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考量研究樣本的數量與代表性下，建議未來的研究者繼續收集更多的個案樣本，以諮商的不同段落或者階段收集研究資料，或者以個案特定的議題，探討個案在不同的諮商階段，在 C-SEQ 的晤談反應並做比較。其次，未來的研究亦可進行心理師和個案性別、認知風格或依附風格等的配對，或者結合 C-SEQ 和諮商歷程、諮商結果的相關變項，例如：認知風格、諮商中的未說話語、情感轉移/反轉移、工作同盟、諮商滿意、徵狀改變或者諮商成效等變項之探討，進一步了解 C-SEQ 和上述變項，在諮商歷程的作用。再者，未來的研究者可以考慮以心理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心理師層次 CSEQ 內部結構之探討，確認心理師層次的 CSEQ 因素結構，以及進行心理師晤談感受的相關研究。此外，未來除了可以進行個案和心理師的配對研究外，亦可一併探討諮商段落層次 C-SEQ 的內部結構，如果能同時收集個案層次、心理師層次和諮商段落層次 C-SEQ 的資料及分析，更能完整地確認 C-SEQ 的內部結構，以及增加 C-SEQ 的適用性。最後，未來的研究者可在考量國內的民情和文化脈絡下，建構及發展本土評量諮商立即影響的工具，並和 C-SEQ 作比較和探討。

參考文獻

- 王麗斐、林美珠（2000）：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之發展與編製。**中華輔導學報**，9，1-24。[Wang, L. F., & Lin, M. J. (2000).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roup therapeutic factors inventory. *Journal of Chinese Guidance*, 9, 1-24.]
- 江宛凌、陳慶福（2008）：以塔羅牌為諮商媒介所引發低自尊當事人之重要事件與晤談感受初探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4，107-145。[Chiang, W. L., & Chen, C. F. (2008). An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events and session impact in counseling with low self-esteem undergraduates by using tarot.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4, 107-145.]
- 李偉斌、陳慶福、王智弘（2008）：網路即時諮商與晤談諮商中助人技巧、工作同盟與晤談感受之研究－以準諮商員為例。**教育心理學報**，40（1），1-22。DOI：10.6251/BEP.20071128。[Li, W. P., Chen, C. F., & Wang, C. H. (2008). Agreements on working alliance and session impact in cybercounseling and interview counseling.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0(1), 1-22. DOI: 10.6251/BEP.20071128]
- 林瑞吉、劉焜輝（1998）：序列分析在諮商歷程研究的應用－以兩組諮商個案為例。**師大學報：教育類**，43（1），49-86。[Lin, Z. J. & Liou, K. H. (1998). Sequential analysis applied to counseling process research: Two cases study.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43(1), 49-86.]
- 桂川泰典・国里愛彦・菅野純・佐々木和義（2013）。日本語版セッション評価尺度（The Japa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J-SEQ）作成の試みカウンセラー評定による検討。**ショートレポート**，22（1），73-76。DOI: 10.2132/personality.22.73。[Taisuke, K., Yoshihiko, K., Jun, K., & Kazuyoshi, S. (2013).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J-SEQ): Therapist-level analyse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2(1), 73-76.]
- 陳斐娟（1996）：諮商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工作同盟與諮商結果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Chen, F. J. (1996). *Relation among important events, working alliance and session impact*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unghw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unghwa, Taiwan.]
- 陳慶福（1995）：諮商員和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的同盟、口語反應模式與晤談感受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Chen, C. F. (1995). *Relation among working alliance, verbal response modes and session impact*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unghw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unghwa, Taiwan.]

- 陳慶福、王雅萱 (2018)：焦慮依附風格個案在諮商初期的晤談感受、工作同盟與諮商滿意之關係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0(2)，267-291。[Chen, C. F., & Wang, Y. H. (2018).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sion impact, working alliance, and counseling satisfaction on the preoccupied clients with attachment style in the initial counseling stag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2), 267-291.]
- 陳慶福、林妙容 (2016)：諮商初期的晤談感受與諮商滿意關係之探究。銘傳大學主辦「2016 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的融合與應用」宣讀之論文（台北）。[Chen, C. F., & Lin, M. J. (2016).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sion impact and counseling satisf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loring psychology in our work place: The integration of counseling and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theories.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 陳慶福、劉嘉蕙 (2019)：中文晤談評量問卷內部結構及其信效度之探究：諮商心理師層次分析。**國立屏東大學學報：教育類**，6，117-118。[Chen, C. F., & Liu, C. H. (2019). A study of internal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EQ): Counselor-level analyses. *Journal of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ducation*, 6, 117-118.]
- 廖鳳池 (1994)：諮商員自我認知對諮商關係暨諮商行為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Liao, F. C. (1994). *Th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unselor self-cognition on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nd counselor behavi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戴谷霖 (2012)：婚姻受暴婦女知覺諮商中的重要事件及自尊、晤談感受與諮商滿意之成效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Tai K. L. (2012). *An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events, self-esteem, session impact and counseling satisfaction in counseling with a battered woman who witnessed domestic violence*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ingtung, Taiwan.]
- 簡華姘 (2006)：華人文化脈落中諮商與心理輔導專業工作者之反移情處理能力、孝道信念與順道行為對諮商效能的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Chien, H. W. (2006).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management, filial piety and living up to parental expectation o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efficacy*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Bagozzi, R.,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s*, 16, 74-94. DOI: 10.1007/BF02723327
- Byrne, B. M. (2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ummings, A. L., Slemon, A. G., & Hallberg, G. T. (1993). Session evaluation and recall of important events as a function of counselor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0*(2), 156-165. DOI: 10.1037/0022-0167.40.2.156
- Dill-Standiford, T. J., Stiles, W. B., Rorer, L. G. (1988). Counselor-client agreement on session impact.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5*, 47-55.
- Hafkenscheid, A. (2009). The impact of psychotherapy sessions: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Dutch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82*, 99-111. DOI: 10.1348/147608308X380750
- Hair, J. F. Jr.,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Hartmann, A., Leonhart, R., Hermann, S., Joos, A., Stiles, W. B., & Zeeck, A. (2013). Die evaluation von therapiesitzungen durch patienten und therapeuten faktorstruktur und interpretation des SEQ-D. *Diagnostica, 59*(1), 45-59. DOI: 10.1026/0012-1924/a000078
- Heppner, P. P., Wampold, B. E., & Kivlighan, D. M., Jr. (2008). *Research design in counseling* (3rd ed.). Belmont, CA: Belmont.
- Hill, C., & Lambert, J. (2004).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tudying psychotherapy processes and outcomes. In M. J. Lambert, M. J. (Ed.), *Bergin and Garfiel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5th ed., pp. 84-135).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 Hill, C. E., O'Grady, K. E., Balenger, V., Busse, D. R., Falk, D. R., Hill, M., Rios, & Taffe, R. (1994). Methodological examination of videotape-assisted reviews in brief therapy: Helplessness ratings, therapy intentions, client reactions, mood, and session evalu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1*, 236-247.
- Horvath, A. O., & Marx, R. W. (1990). The development and decay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during the time limited counseling. *Canadi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24*, 240-259.
- Joreskog, K. G., & Sorbom, D. (198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4), 404-416. DOI: 10.2307/3151714
- Kaiser, H. F. (1974).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rika, 39*, 31-36. DOI: 10.1007/BF02291575
- Kim, B. S. K., Liang, L., & Lee, L. C. (2003). Counselor ethnicity, counselor nonverbal behavior, and session outcome with Asian American clients: Initial finding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1*(2), 202-207. DOI: 10.1002/j.1556-6678.2003.tb00243.x

- Kivlighan, D. M., Angelone, E. O., & Swafford, K. G. (1991). Live supervision in individual psychotherapy: Effects on therapist's intention use and client's evaluation of session effect and working alliance. *Professional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2, 489-495.
- Kivlighan, D. M., Marmarosh, C. L., & Hilsenroth, M. J. (2014). Client and therapist therapeutic alliance, session evaluation, and client reliable change: A moderat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1(1), 15-23. DOI: 10.1037/a0034939
- Kline, R. B. (1998).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Y: Guilford Press.
- Lepper, G., & Riding, N. (2006). *Researching the psychotherapy process: A practical guide to transcript-based method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Mallinckrodt, B. (1993). Session impact, working alliance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brief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0, 25-32. DOI: 10.1037/0022-0167.40.1.25
- Mallinckrodt, B. (1994). Session impact in counseling process research: Comment on Elliott and Wexler (1994) and Stiles et al. (1994).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1(2), 186-190. DOI: 10.1037//0022-0167.41.2.186
- Noar, S. M. (2003). The rol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scale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0, 622-647. DOI: 10.1207/S15328007SEM1004_8
- Reynolds, S., Stiles, W. B., Barkham, M., Shapiro, D. A., Hardy, G. E., & Rees, A. (1996). Acceleration of changes in session impact during contrasting time-limited psychotherap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4, 577-586. DOI: 10.1037/0022-006X.64.3.577
- Samstag, L. W., Batchelder, S. T., Muran, J. C., & Safran, J. D., & Winston, A. (1998).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treatment failure in short-term psychotherapy: An assessment of therapeutic alliance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Practice and Research*, 7, 126-143.
- Sharma, S. (1995). *Applied multivariate technique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Siegel, D. F., & Hilsenroth, M. J. (2013). Process and techniqu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tient ratings of session safety during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67(3), 257-276.
- Stiles, W. B. (1980). Measurement of the impact of psychotherapy sess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8(2), 176-185. DOI: 10.1037/0022-00X.48.2.176
- Stiles, W. B., Gordon, L. E., & Lani, J. A. (2002). Session evaluation and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In G. S. Tryon (Ed.), *Counseling based on process research: Applying what we know* (pp. 325-343).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Stiles, W. B., Reynolds, S., Hardy, G. E., Rees, A., Barkham, M., & Shapiro, D. A. (1994). Evalu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psychotherapy session by clients using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and

- Session Impact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1(2), 175-185. DOI: 10.1037/0022-0167.41.2.175
- Stiles, W. B., Shapiro, D. A., & Firth-Cozens, J. A. (1988). Do session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have different impact?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5, 391-396. DOI: 10.1037/0022-0187.35.4.391
- Stiles, W. B., & Snow, J. S. (1984a). Counseling session impact as viewed by novice counselors and their cli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1, 3-12. DOI: 10.1037//0022-0167.31.1.3
- Stiles, W. B., & Snow, J. S. (1984b). Dimensions of psychotherapy clinical session impact across sessions and across client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3, 59-63. DOI: 10.1111.2044-8260.1984.tb00627
- Thompson, B. J., & Hill, C. E. (1993). Client perceptions of therapist competence. *Psychotherapy Research*, 3, 124-130. DOI: 10.1080/10503309312331333729
- Tyron, G. S. (1990). Session depth and smoothness in relation to the concept of engagement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7(3), 248-253.
- Vittorio, L., Antonello, C., Daniela, G., & Annalisa, T. (2011). Exploration of session process: Relationship to depth and allian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8(4), 391-400. DOI: 10.1037/a0025248
- Wortzel, L. (1979). *Multivariate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收稿日期：2018年03月05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8年07月23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8年09月27日

三稿修訂日期：2018年10月01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8年10月01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9, 50(4), 637-658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 Study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EQ): Client-Level Analyses

Ching-Fu Che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Kai-Ting Ch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Th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 which is a self-rating instrumen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unseling sessions. The SEQ may be conceived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and outcome. The SEQ Form 5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SEQ; Stiles, Gordon, & Lani, 2002) includes 21 bipolar adjective scales in a 7-point semantic differential forma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clients' responses to the Chinese SEQ (C-SEQ),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Chen and Lin (2016). The clients' responses to the C-SEQ were elicited and then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SEQ. **Methods:** A total of 200 clients from 21 Taiwanese universities were recruited using heterogeneous convenience sampling by the researchers between April 2017 and July 2017. After each client attended his or her latest individual counseling session, he or she was asked to complete one copy of the C-SEQ. Thus, our collected data were drawn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e influences of counseling sessions, including the dimensions of session evaluation and postsession mood evaluation, were measur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rroborated the premise that four factors are elicited from the C-SEQ, namely Depth, Smoothness, Positivity, and Arousal. Thus, the C-SEQ assesses two dimensions of session evaluation, Depth and Smoothness, as well as two dimensions of postsession mood, Positivity and Arousal. **Conclusi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SEQ encompasses four factors: Depth, Smoothness, Positivity, and Arousal. Inter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Depth, Smoothness, and Positivity were between low and medium (.27- .67, $p < .01$). The C-SEQ is now available as an instrument for giving feedback regarding counseling practice and counseling process research in Taiwan.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limitations in this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counseling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offered by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Chines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C-SEQ), Internal structure, 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Form 5 (SEQ-5), Session Effect